记“国际明清史研讨会”

刘 诔 聪

由香港大学中文系主办作为庆祝港大创校七十五周年纪念活动之一的“国际明清史研讨会”已于1985年12月12至15日在港大举行。与会者分别来自26个地区，注册的共有112人，其中除去10人临事因故未能参加外，实际出席的有102人。

12日下午四时，研讨会由香港大学校长黄丽松博士主持开幕典礼。黄校长致辞时指出，是次研讨会具备之特殊意义，在于提供一极难得的机会。促进各地特别是海峡两岸明清史学人的学术交流。今次出席的国内和台湾学者约四十人，大家能聚首一堂，用客观的态度和冷静的头脑，共同切磋，实有赖于香港的特殊环境。黄校长又指出，明清两代是由传统过渡至现在的桥梁，要了解传统中国的面貌和近代思潮的源流，都得从研治明清史入手。现代中国所面对的难题及知识分子的思想重担，有不少都是明清两代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是以现代学人深入探讨这五百多年的历史，并利用他们的成果去解决当前的历史问题，便尤其富有经世之时代意义。假如能通过今次研讨会，刺激彼此之思考和反省，促进新观念之成长，以达成更合理的历史解释，当为筹办同人之深切期许。

为配合“国际明清史研讨会”的举行，大会主席赵令扬教授又创办了《明清史集刊》，作为对建校七十五周年另一献礼，并于会议首日派发。《集刊》暂定每年出版一期，希望为明清史研究同行及香港年青一代提供发表园地。创刊号《集刊》共刊载香港及海外学人所撰中文论文8篇，英文论文2篇，内容以政治及学术思想为主。

与此同时，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又特地举办“馆藏明清善本史籍展览”，展期由12月12日至30日，展出明清善本古籍12种。

提交大会的论文共74篇，其中17篇为英文著作；另有学术报告6篇。因时间有限，部分论文不在会中宣读。研讨会为期4天，除6篇“学术报告”在同一会场内接连宣读外，其余分两会场举行，每篇论文宣读及讨论的时间约有30分钟。两会场一共进行了18组，每组平均约有1篇论文。以下就提交之报告和论文，加以简介。

一、学术报告

提交的6篇学术报告紧接开幕典礼后宣读。王春瑜的《一九四九——一九八四明史研究述评》总结了35年来明史研究的成果，并指出“两头（明初、明末）大，中间（明中叶）小，一头（明末）沉”和“一窝蜂”的不良倾向。唐振常的《上海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工作简介》分别介绍了该所整理史籍、编纂人物传记及开拓专题研究，特别是《上海简史》和《上海史》的出版计划等。此外，王戎笙亦简介了由国家资助的《清代通史》10卷及《清代人物传稿》20卷两项计划，希望在1990年完成。

台湾方面，冯明珠就国立故宫博物院所藏清代档案之整理、出版与开放作了报告，并透露该院正在筹备全面化电脑作业。徐泓亦介绍了《明实录分类索引》的编制计划，准备利用电脑将输入之分类资料编制索引。整部索引约分十一大类，下分一千二百多子目，目前初步完成的部分，有些已经发表。此外，庄吉发又即席就台湾方面有关秘密会党之档案整理作了

一简短报告。

二、政治问题与对外关系

是次研讨会共有4篇关于明初政治的文章和2篇关于明中叶政治的文章。刘孔伏和潘良炽合撰《从〈大诰〉看朱元璋对吏治的整饬》△，对朱元璋致力改善吏治的成绩作出了合理的评价。钱伯城的《宋濂：光荣与悲剧》借宋濂的一生，反映出明初开国文臣的遭际之隆以及悲剧性的结局。吴泽《明初洪武、永乐年间的封建专制主义君主制研究》致力探讨这个时期的相权与皇权的矛盾以及政权结构由中央集权向君主专制之过渡。赵令扬《仁·宣朝之元老政治》△，道出成祖朝之年青官员于仁·宣时已相率步入中年，政治经验更趋成熟，直接有助于两朝之致治。杨永安《正统、天顺间内政外交初探》△对向为人所垢病之英宗朱祁镇重新评价，认为英宗在位时之内政外交未尚不有足以使人称善之处。
苏均炜《严嵩与夏言》提出"是严嵩杀夏言的吗？"的疑问，认为传统史家"故意不分清红皂白地一概将多时任性妄为的专制君主所作所为的罪恶来强加在一个恭顺的辅臣身上"，使严嵩百世含冤。

关于官制方面的论文有3篇。张治安《明代阁臣之出身经历及籍贯》就有关资料，归纳出明代因各省区文化水准和经济发展之不同而形成的阁臣籍贯之分布情形。缪全吉《明清地方制度中道员功能的分析》从行政理论与实物两方面评估明清道制，并提出道制在现代中国地方行政上可资参考之处。何冠彪《论"太监"一官名之起源及其在明清两代之演变》△指出"太监"一官名源于隋制"大监"，但自隋至元"大监"、"太监"皆非阉官；到了明初，才以"太监"作为部分宦官之官名，逐渐成为滥称；而满人在入关以前结交的明朝宦官，都是"太监"或带"太监"衔出镇监军者；因而误以"太监"等同宦官，到入关后仍沿袭不改，因此便形成"太监即宦官"之观念。

此外，冯尔康以《江宁织造曹家的被抄及其原因》推翻了江宁织造曹頫家庭被雍正查抄是与朋党斗争有关的说法，认为曹頫是在雍正初年实行清理财政，整饬吏治政策时因经济亏空而获罪的。冯氏又指出，应该排除为尊者讳及爱屋及乌的观念，曹頫被抄丝毫不影响他的后人曹雪芹以及《红楼梦》的评价，而雍正也不应长期被目为不义。

在"晚清的政治改革"一组里，共宣读了4篇论文。谢延庚《李鸿章对兵工业建设的认识》析述李氏在甲午战前尝以兵工建设为自强的首要之图，并以人才为建设之命脉，借未为史学界所充分注意。李时岳《洋务运动论纲》△肯定了洋务运动的进步意义，认为此运动对维持社会安宁、防御外来侵略、累积改革的物资基础及精神力量，以及构成民族资本主义等都产生了作用。贺凌虚《清末政治体制的变革》以为自庚子拳乱后，清廷虽力图拖延改革，但实际上已自绝对君主政体逐渐转向有限君主政体。孙广德《清末宪政运动时期民主政治的提倡与设计》指出宪政运动时期的民主政治思想，虽大体上仍为维新运动时期的延续，但已较深入而周密；倡导者虽崇信西方民主政治，仍受中国传统影响，依当时环境而有所变通。

在"政权统治"一组里，马泰来宣读了《从明代书院创办人的身份和背景看其"私办"的程度》#.认为历史上只有宋代的书院才真正具有私办的性质，根据明代方志及明人著作，可知当时大部分书院是由政府官员直接管理的，其中有基于对办学之兴趣而以私费筹建的，但也有滥用职权，动用政府财产以佐捐修者。蒲地典子宣读了《清代的司法文化——法官判牍初探》#，利用东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判牍，对认为公堂之上只审刑事重案不审民事诉讼之传

统观念提出怀疑，以为清代法庭与群众间，并非如后人想像般隔膜。陆鸿基《清代的监狱》从律例、官箴、时人记录和小说等，勾划出清代监狱的概况，以及州县官以至朝廷处理监狱问题的办法。

在“清代之中西关系”一组里，汪瑞炯《全盛时期（1873—1887）外来鸦片及土产鸦片贸易的比较研究》# 利用海关刊物、英国领事报告和中国官员的记录等，探讨外来及土产鸦片的性质，以及两者的竞争，并企图通过这项研究为自强时期中外贸易及外交关系之研究提供另一基础。K.L.Maopherson《清王朝与黄埔江：生活的训练》# 致力探讨上海居民及聚居外人都得面对之江水污染和流行性疾病散播的问题。梁伯华《中国派遣留学生的决定：一个革命性的决策》# 认为清廷派遣留学生的决定只是在国内欲学习西方技艺失败后的一项不得已的政策而已，在本质上仍是保守的，但此举已不自觉地将中国现代化向前推了一步。杨意龙《香港与辛亥革命——孙中山早期活动之重新评价》# 提出孙氏是第一个以合并多种社会制度的方法去改革中国的人，而这又和孙氏在香港这特殊环境下受众多知识背景之影响有相当的关系。

“对外关系”一组共四篇论文。张存武《明清时代的中韩边界问题》以康熙五十一年之勘边立碑为关键，讨论长白山南之中朝边界问题。本文宣读后更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韦杰夫（G.P.Wade）《明清资料中的“婆罗”》# 指出《明史》里虽有“婆罗”的详细说明，但事实上明代并无称为“婆罗”的地方。作者从多种资料，追溯出《明史》中此等记载的来源以及从“娑罗”演变为“婆罗”的传误。黄康显《中英两国对设置中国领事的态度》认为清末中国设置海外领事，主要是基于道义上的责任，而英国答允的理由只是环境的需要，如果这种需要一旦与殖民地政府的利益冲突，则领事的权利以至存在，便受到威胁。冼玉仪《从清廷拟设驻港领事看清末中港关系》# 从清廷欲急切设立领事但因香港官民极力反对而不遂道出中港关系的微妙，为此目前举世瞩目的问题作一历史性的回顾。

另外4篇论文构成了“澳门：中西关系之个案研究”一组。约翰·威尔斯《澳门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1608—1808）》# 将两百年间澳门的历史划分为六个时期，籍以反映出明清以来外交政策之转变。该文与霍启昌的《明廷对在澳门的洋人之管理方式》# 略有相类而重点各有不同。罗德里奇·柏台克《明代从帝汶到澳门及中国的檀香贸易》# 析述十六和十七世纪葡商和荷商之经营檀香，指出荷商并不如葡商般成功地把檀香直接运至中国，而只是倚靠华商为媒介，把檀香从印尼运至中国。黄启臣、邓开颂《十六至十九世纪西欧殖民国家对澳门贸易的争夺》分析了这场长达二百多年的“商业战争”和“殖民战争”，认为这种战争一方面为西方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另方面却阻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

三、史学、思想和文学

关于史学的论文共有6篇。黄彰健《〈明史·功臣世表〉考证》取《明实录》诸书所记，以补该表之缺略，并订其讹误。陈学霖《明代之宋史学——柯氏〈宋史新编〉述评》以柯维骐之著作为中心，考究明中叶以后私家学人对《宋史》之改修及所反映之汉民族本位历史观，认为柯著改创义例，尊宋于本经，降辽金于四裔，开此后重修之先河。何佑森因故未能出席，先前提交的论文是《明末清初史学上的一个重要问题》△，指出明清之际学人迫于实际的需要，突破了传统的经学观念，从经术经世改讲史学经世，认为内心世界的道德实践不切实际，故必须落实到人事和制度上去讲史学义理。陈捷先《从经世思想看蒋良骐的〈东华录〉》

就国家兴亡、民生休戚、人才邪正，天人感应诸端，论述《东华录》之经世思想，指出该书以史学义例准之，固非佳作，然内蕴经世大义，致令该书流传广远。司徒琳《二十世纪中国之南明史学》# 分析了清末民初，日军东侵及国共分家诸时期史学界对南明史事之研究，每本"春秋大义"笔法，重申"内"与"外"、"正"与"伪"之观念。作者更指出，由于南明史研究最受重视之时，正值民族苦难艰深之际，所以她希望以后南明史再不会受人注意！关捷《甲午中日（日清）战争研究概说》就甲午战争的原因和性质、两次海战的讨论，有关人物之评价等方面，论述了自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间中外史坛之研究成果，资料相当详细。

学术思想方面，提交的论文共12篇，其中有论述学术思潮总貌的，也有论述某一学派以至某一思想家之学术思想的。程一凡《明代思想史研究新方法之探讨》# 强调要注意社会变迁和政治环境对思想形成的影响，利用缜密的思想史学方法，并配合现代社会学、心理学的眼光去重新整理明代思想史。王家俭《晚明的实学思想》全面探讨了当世具危机意识与历史使命感的知识分子的实学立场、籍贯分布及其对中国学术史的影响。杜婉言《赵士桢及其〈神器谱〉初探》发掘了在中国史上濒于湮没的《神器谱》，高度评价了作为文臣的赵士桢"摆脱溺于文墨、空谈心性的学风，为振扬国威、富国强兵而力排万难，切实钻研兵事，自出家财研制、更新火药武器并取得显著成果"。王钟翰《试论康熙的农本思想》依据近年出版的多种康熙朝档案文献，指出康熙农本思想之形成，主要是吸取历史教训，以隋、明两代之灭亡为鉴，而时时观览《贞观政要》，亦于治道多所领会。刘健明《程廷祚与颜李学派》虽承认程氏早年确服膺颜李，但同时指出程氏受考据学风影响，对二子论学之粗疏感到不满，故颜李学派实际上已日渐消歇。汤志钧《清代今文经学的兴替》通过清中叶以后各个阶段今文经学的发展，窥探旧思想如何注入"新"内容，而新思想又怎样未能冲决经学的藩篱。李家树《姚际恒〈诗经通论〉和方玉润〈诗经原始〉：清代传统诗经学的反动》亦探讨了二书如何跳出清代传统诗经学的范围，致力恢复诗歌的原来面目，欣赏诗人的艺术。李锷《边防与国防：左宗棠征新疆的战术研究》# 探究左宗棠及其指挥下的刘、张、金诸军征服新疆的战术，认为是近似德国"快速歼灭战"的形式。王玉棠《刘坤一的"洋务"思想及贡献》△着重讨论刘氏晚年抛弃了初期对洋务措施的排斥态度以及敷衍塞责的作风，转而与李鸿章、张之洞同心推行洋务新政。关于严复的论文共有2篇。单周尧《严复译〈天演论〉对中国思想界之影响》以"敲响祖国危亡的警钟"、"播下日后革命的种子"及"介绍西方思想进入中国"为严氏译著之贡献。林启彦《严复的"保守"政治论——〈政治讲义〉的一探析》对美国学者本杰明·奇沃兹谓严复自始至终为一自由主义者，主张西化并据西方学说以改造中国的说法持有异议。林氏认为通过《政治讲义》，可见严复固非无一贯之政治思想，但亦非贯彻虔守自由主义。此外，陆人龙《论辛亥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指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学说大多采兼收并蓄和自由注释的态度，故不少讨论往往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原来的理论架构，向当时无政府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因为其中的革命阶段论，同时他们根本未重视过这部分学说。

文学方面提交的论文只有2篇。何沛雄《刘大櫆的古文理论》并不同意章太炎批评刘文"毫无足取"，认为刘大櫆的古文理论"上可补充方苞所说'义法'中的'法'，下可启迪姚鼐'因声求气'之说"。陈耀南《凭诗存国恨，因话戢时风——〈射鹰楼诗话〉的别开生面》称许林昌彝所为诗话，扶翼风教，归本时务，而选录时人抗英禁烟之作，亦为一代实录，

较之传统诗话，可谓创格，实介乎诗话与史传之间。

四、社会经济之发展

提交论文中有关社会经济的共6组。在“人口与赋税”一组中，徐泓《明永乐年间的户口移徙》以实录与方志等资料为主，探讨永乐年间采行移徙政策的背景，移徙的类型、规模与路线，以及执行的成效与影响。李龙潜《明清丈量鱼鳞清册残卷中的几个问题》就所接触到的数千鱼鳞总图和分图，结合其他文献，论证了明清时期土地高度集中的问题，又指出当时上报的税数往往较实际征收的税数偏低。叶显恩《明清珠江三角洲人口问题》勾勒了该地区人口变动之大势，探讨了人口压力对该地区农业商业化，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和动乱的爆发所起的作用。谭棣华《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的世仆》研究出该地区世仆制之特点，如带有浓厚的宗法性质，蛋民被勒迫为世仆等，又指出在主仆纷争中，政府往往站在家主一边，从政治法律上维护世仆制。

在“土地与绅士”一组中，郑克晟《明代江南地主的衰落及北方地主的兴起》认为留恋元朝太平的江南地主对朱朱元璋政权每表示冷漠，致使朱元璋统一后对其打击不遗余力，随着建文改革之失败及永乐镇压之加强，江南地主遂日渐衰落，然其与北方地主之矛盾，却一直在朝廷内部政策中有所反映。袁清《明末清初江南的族田经营和宗法势力》以明末清初江南地区为族田经济发展最典型者，又指出宗族制度之延续和宗法势力之加强与族田经营不无关系，故此特意提出这个新课题，补充过去研究的不足。山根幸夫因故缺席，原定宣读论文为《清代的绅士——关于常熟曾氏的考察》△，根据《海虞曾氏家谱》来考察自明末至清末期间江苏省常熟县的曾氏家族科举中试之人数，并比较中试者与不中试者家族的生活方式，从而论证绅士社会中也存在着阶层性。吕元骢《从广东的情况看光绪朝(1875—1908)绅士》# 研究广东地区雋秀变质的情形，并探讨考取功名者的竞争对手和在公共事务上扮演的角色，以及在变迁中带来的政治、社会与经济方面的影响。

在“财政与土地发展”一组中，张彬村《明清货币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认为明清时期所谓银铜双元制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表面上的“拟双元制”，白银基本上是一种商品而兼具通货功能，虽然减少了因货币或相关因素引起的经济动荡，但也限制了若干经济活动之流动性与进取性。科大卫《清末之通货膨胀》以“地方势力之兴长”、“白银在国际市场上价格之变动”及“双金属货币制之特点”等为清末之通货膨胀之因由，并分析物价之演变以求知通货膨胀之后果。黄冕堂《论清代前期的租佃关系》分别讨论了雍乾间的社会经济变化及清前期的缙绅地主和庶族地主各自之主佃关系。陈支平《清初更名田立法考实》重新评估了“更名田”，对向来史家称此法具进步意义的说法不表同意，以为清初的大部分更名田，实质上是和明代江南重赋官田一样的。

在“社会及经济冲突”一组中，汤明檖《明季社会经济中的矛盾》提出明末经济之长足发展具体表现在手工业和农业日益分离以及商业资本高度发展这两方面上，罗炳绵《明清牙侩的渊源和发展》分别论述了“牙侩”源流及其意义的演变、国内贸易范围内的牙侩、牙侩在海外贸易扮演的角色以及明清牙侩与商业发展之关系。韦庆远《论清代的“皇当”》利用原始的宫廷机密档案为主要史料，论析清代皇当由肇始至衰替之发展，认为皇当确曾起过调节社会金融、维持社会繁荣安定的作用，然而由于经营不善，效率偏低，加上国家经济日蹙，遂不断关歇和变卖内务府所管辖的皇当以调用资金，皇当遂日衰替。庄吉发《从社会经

济变迁看清代台湾秘密会党的发展》就现存档案及有关区域研究成果，发现台湾秘密会党是由异姓结拜组织发展而来的分类械斗团体，各会党彼此不相统属，郑成功或陈永华创立天地会及父母会由天地会转化而来等诸说俱不能成立。庄氏又主张称下属社会的异姓结拜组织为“会党”而不称含义不尽相同的“会社”、“帮会”等；而各会党的宗旨主要是患难相助，并未含有浓厚的种族意识或反满的政治意味。

在“宗教与叛乱”组中，曹仕邦《明成祖对佛教之政治利用》依据永乐诸文献，考证成祖确曾利用佛教以解释其得位乃得佛祐，属天与人归。戴玄之《明末的白莲教乱》从广义的层面上论述明末的白莲教乱，并一反传统以为白莲教系“种族革命”、“民族意识极强”之说法，谓教中为汉奸、国贼者，大有人在。喻松青《江浙长生教与〈众喜宝卷〉》对长生教的渊源、宗旨信仰及教规、戒律等作了探讨，认为长生教继承了黄天道佛道混杂的内容，更加添了儒的色彩，倡三教一家说，发展至道光时主要是寻求个人解脱、追求长生的宗旨团体，但仍不免被朝廷视为邪教，每欲加以歼灭。汤维强《明代的“叛乱”和“盗匪活动”》*利用多种方志，探讨明代千余郡中约六百多件叛变事件，指出此等叛乱之发生乃与中央政府在地方上之控制能力有关，而生态环境也会影响农民之起事。

在“晚清社会抗义运动与经济发展”一组中，刘石吉《长江下游地区手工业工人抗议运动的型态1600—1920年》指称近代较为先进的工业都市中（尤其是上海）仍拥有甚多的传统手工业及大批的手工业工人，他们的生产组织及抗议类型，与近代机器化工厂中的产业工人殊异其趣，而与明末及清初的手工业匠人则颇多历史渊源，这与西方以传统手工业工匠构成早期工人运动的主要基础，有着根本的差异。陈明銶《清季中国工人运动：珠江三角洲之民众动员与经济和爱国性斗争》指出该地区特别是广州和香港的工人，在帝国主义与殖民地政权之压逼下，除为维护本身行业利益外，亦基于爱国意识与民族感情而投入各种革命活动，奠下日后工运蓬勃发展之基础。张维安、赖泽涵《近代中国工业化起点问题——以轮船招商局的官督商办为例》强调清政府以政治干预经济在“方向上”的不当性，及干预效果之不彰，指出“官督商办”制度的形成在当时是一种自然的趋势，无奈制度、管理与意识型态对于工业化之不相配合，则是传统中国官办企业的重大缺失，使“官督商办”走向“官督官办”，官僚中饱私囊，使官僚气息弥漫于新式企业中。连浩鋈《晚清广东地区之重赋》*△分析了晚清时期该地区官吏征收之正式的、非正式的、甚至非法的赋项，并指出了此等重赋的压力在社会上种下了不安定的种子。

在所有论文和学术报告宣读完毕后，闭幕讨论随即于15日上午举行。会上赵令扬主席公开征求补充意见与批评。各地学人都踊跃发言，咸称是次会议成功，向筹委会表示谢意，并提供了宝贵的、有建设性的意见。

陈学霖、胡守为两教授都一致认为香港具备有利条件，在此举办研讨会，集中四方学人，推动学术交流，贡献是不可低估的。李锷博士也感到这类型的国际性会议在香港举行，可以增加两岸的合作，融会两岸的研究成果，对西方的批评作一交代。与此同时，来自两岸的学人也很珍惜这次聚首的机会。吴泽教授公开向台湾师友问好，并说一个“好”字，已代表了千言万语，又半开玩笑地说希望海龙王把大陆和台湾接连起来。缪全吉教授立即笑说一次大地震已经可以将大陆和台湾连起来，不必等海龙王帮助，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此外，韦庆远教授也形象今次研讨会是“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希望大家要珍重在今次会议所建立的友谊，为共同繁荣明清史的研究而努力。

韦庆远教授又提到是次盛会应该记入现代史学史，吴泽教授也深表同意。此外，汤维强博士也建议大会将是次研论会筹办以至举行的过程纪录下来，张存武教授亦建议将是次纪录寄到《汉学研究通讯》发表。对于这些提议，赵主席均表接受，并说不日将会发稿至大陆及港、台等地刊物。

对于是次研讨会的各项安排，几位学人也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意见。王春瑜、王锺翰两教授都感到今次会议安排得太紧凑，讨论时间不足，希望下次有所改善。汤维强博士则提出下次除了学者外，希望也可以邀请从事史料管理工作如图书馆人员等前来参会。再者，缪全吉教授亦提议下次会议可鼓励本科生参加，让年青一代有机会了解前辈走过的道路。

会上不少学人都促请大会尽快举行第二次会议。吴泽教授说如果要等到1988年就太久远了，最好在1987年便召开。赵主席回答说假如可以的话，自然当仁不让，但得看年青一代干劲如何。冯尔康先生也提到南开大学本欲召开继1980年国际明清史学术讨论会后的第二次会议，却因郑天挺教授之逝世而拖延，也许在未来还要召开。

对于明清史研究的现况，与会者也发表了一些意见。王钟翰教授批评目前国内明清史研究有着分工过细的倾向，主张明清史学人应尽量推广一己之知识层面，不要只熟悉个人研究专题。黄彰健教授则对当前尚未解决之历史问题多所感慨，例如会上讨论过的工人运动和官督商办，在今日仍未解决，所以他希望史学家多作考虑和关注。

赵主席最后总结时表示：今次提交论文和报告定会结集出版，希望与会者将定稿于1986年3月31日前寄交港大中文系，使论文集早日面世。赵氏又透露：是次会议花费不足一万美元；四方学人云集，也是两岸学人共同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研讨会；而注册人数中女性占去十分之一，亦为历次中国学术研讨会之冠。这些突破，都是令人鼓舞的，抑亦显示了港大日后仍以天下日川归大海为已任。最后，主席又指出，历史研究应该是理性的研究，长期以来明清史研究过分感情化的倾向应该改变，以配合现代社会所需；而在参改前辈的成果之余，努力发掘开辟新的研究道路，就是年青一代学者的责任了。

综观今次研究会，气氛大致上是相当融洽的。诚然，由于大家持有不同的学术观点，两岸学人难免有意见相左的地方。例如对传统经学是否已消失于历史舞台上，两岸学人即持相反之意见。但两岸学人不避征引对方论著，也未尝不是值得庆贺的事。会上两岸学人互有发表客观、善意的批评，对筹办同人亦未尝不是一种鼓舞。与会者有权威的明清史专家，也有不以明清史为主要研究范围的学人，今次聚首争鸣，成绩如何，以后自有撰写现代史学史的学人去作公正的评价。然而与会前辈对年青一代的鼓励与期许，是否已激发起新一代接棒的勇气和继绍的使命感？这也许亦要由历史来解答了。

（1985年12月25日于香港大学柏立基学院）

• 论文以英文撰写

△论文不在会中宣读